

“彻底”的“反传统”论的“底”

傅 然

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20世纪的80年代，炎黄子孙之中，出了这么一种——“反传统的英雄”，他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、文化传统描抹得一团漆黑，自诩要给中国文化“大换血”，要“使国人脱胎换骨”，“重建”“人的生命本体”。其调门最高者，甚至扬言：“我无所谓爱国、叛国，你说我叛国，我就叛国！我就承认自己是挖坟的不孝子孙，且以此为荣。”^①如此“文化精英”的作为，不仅前无古人，大概也后无来者；即使有，恐怕也是无以复加的了。纵观历史，不可多得，实应深长思之。

(一)

在振兴中华的时代主旋律中，插进了这么一场闹剧，是坏事，也可以变成好事。历史并非偶合，偶然中蕴藏着必然。新的历史关头，把一个屡经争论的总题目再次严峻地摆在大家的面前：中华民族向何处去？两种中国文化之命运又一次面临抉择：是弘扬民族文化，同时吸收国外一切好的东西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艺术，还是彻底背弃民族文化传统，走“全盘西化”的道路？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是这场论争的产物。如果没有那形形色色的华夏文化衰亡论的大肆张扬，是不足以触目惊心，使人看清问题的实质的。

在这种“彻底”的“反传统”论的“底”充分自我表现以后，就不能再把它笼统地和反思历史、剖析积弊、革故取新的良好愿望混为一谈了。一些人过去赞赏这类主张，往往不过是凭自己的想象，从其中看出了它们本来不存在的东西。

你以为它们是要对传统文化采取一分为二的批判态度，促进新陈代谢吗？那你就不够“彻底”了。你这种观点仍然属于应该被“反”掉的“传统”之列。怎样才符合它的尺度呢？那必须是“造成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的幻灭和绝望的冲击”^②。不幻灭、绝望以至于“彻底”，是不能达标的。而“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，据说不过是“一种表面上‘辩证’而骨子里却是中庸、保守、墨守成规、固步自封和划地为牢的态度”^③。真是道不同，不相与谋，你用这种观点去理解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，那是不会被认可的。然而，那“彻底”之论虽“高”，却又难攀，难怪它的宣扬者也慨叹道：“做一个反传统的英雄在中国比登天还难”。

岂止在中国，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，都只能说说而已，和辩证法相碰撞，最终难免导致真正的幻灭和绝望！

但在中国，也确有特殊的难处，那不仅因为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确有其独特坚固之处，不是一笔可以抹杀的，而且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、文化艺术界的先驱们所确立的辩证的历史观、传统观，是对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，并且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验证和

完善的，是不可以用“表面”一类的咒语骂倒的。它注定要成为极端“反传统”论的障碍。人们不禁要问：如果“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是“表面”的辩证观，难道那“彻底的幻灭和绝望”之类的说法，反而符合真正的辩证法？两相对比，真象自明，站在这所谓“表面”的辩证法的对立面的，恰是一套真正的形而上学的东西。要为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开路，就不能不向辩证法挑战，这是它的手段，也可以说是它的目的。

“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”^④。我们以这一“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”为指导，来考察传统问题，就应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，而不能像“反传统”论那样，采取脱离历史的、主观片面的态度。“反传统”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。怎样理解“传统”，为什么要“反传统”，怎样“反”法，各种“反传统”论者其说不一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绝对化。它常常是一堆武断、混乱的结论，与其说是在讲什么道理，不如说是在散播一种偏激狂热的情绪。对这一套如听而信之，信而迷之，就可能像堂·吉珂德那样，把风车当敌人。

在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言论里，“传统”是一种绝对否定的对象。这里，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，还不是如何具体评价某种传统的兴衰利弊，而是如何看待“传统”这一社会现象本身。“反传统”论者提到传统，总是流露出一副鄙弃的神情。殊不知人类没有传统就不会有今天，也不会有未来。从远古时代开始，人们为了求生存发展，就需要把他们获取的经验、知识作为社会的共同财富，传给后代（这便是教育），后人又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、丰富，再传给下代。由此构成人类进步的历程。因此，传统是社会发展的延续性的内在需求和表现形式。它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东西，是积极主动的因应承传，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自然延伸。没有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，就不会产生传统这个东西。生物界的性能的延续，那只能叫“遗传”，不能与人类社会的传统因素相提并论。文明要以传统的方式积累演进，否则，每一代人都得从头开始；社会要有传统的纽带维系，否则将是一盘散沙。不要任何传统的人，将是什么样的“人”呢？连鲁滨逊式的生活也不能完全脱离传统，连想象中的“神”也不能不被赋予某种民族的历史的传统特征！没有任何传统的民族，将是什么样的“民族”呢？连那被奴役而濒于衰亡的民族，也不能没有一点传统，否则，那只能算是某个“人种”，如果他们还能存活下去的话。所以说，历史上只有这样或那样的——或长或短、或广或狭、或新或旧、或优或劣、或盛或衰等——传统之别，而不存在有传统和无传统两类社会的分野。一味地不加区别地鼓吹“反传统”，那无异于反文化、反历史、反社会，最后跟自己过不去。

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，似乎传统固有的因素特别牢固，没有新生的机遇；社会处于变革状态时，似乎一切传统都面临挑战，都要发生断裂。然而这只能是相对而言。因为社会因素千头万绪，矛盾无所不在。稳中有变，断中有续。旧事物中没有内在矛盾，新事物不会凭空出现。新旧之间仍有某种联结。新事物一旦克服、取代旧事物，必因其创造性的优势而获得新的稳定，继而流传下去，形成新的传统，而更新的创造又会形成更新的传统。从总体上看，无数社会传统构成永远运动的开放体系，有的消失，有的新生，此起彼伏，层出不穷。这其中还有某些维系社会存在的传统因素（包括某些文化因素）只能渐变而不能中断，否则就将引起社会大紊乱、大崩溃。比如人类诸多符号系统，特别是语言，就是如此。那些“反传统的英雄”是不会拒绝使用传统的民族语言的（尽管有人对此也存在一种欲罢不能、莫可奈何的心情），更不会把整个人类传统的语言符号系统抛掉的。有关论者可能会说：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意思！那么，好，既然如此，“彻底”论就不免打点折扣了。不加区别地“反传统”，事实上是不能“彻底”下去的。十年动乱期间，这样的教训极多。举件小事，那时有些地方曾经心血来潮，大量更改地名人，以致交通邮电难以畅行，最后不得不屈从传统：再改回来。近年

来，流行某种文风，往往一些世人皆知的道理，偏偏用一些世人难懂的言词去说，其后果，恐怕也无异于那时出现的大量无法投递的信件。你要使那芸芸众生听懂你那“反传统”的新论，首先不免利用一下那传统的逻辑、语言，这真是无法回避的“悖谬”。

只要从“反传统”论主观夸张的迷雾中回到现实中来，就不难发现，传统不是单一凝固、简单重复的东西，像民族传统文化这种大的系统，更是具有极其长远跨度和丰富内含的矛盾统一体。笼统地肯定或笼统地否定，都无济于事。只能根据每一传统的实际内容、历史条件、发展状况作具体分析。它们有的是过时的，失去存在价值的；有的是仍有生命力，处于发展过程中的；有的还是新生的，主要属于未来的。我们必须根据不同情况，区别对待。这里，我们应该把“传统”和“遗产”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。“传统”和“遗产”虽然都是前人遗留给后人的，因而常常被当作一回事。但“遗产”本身只是过去时代的东西，是已经定型的；而“传统”作为一种过程，却是动态的，可能存活于现实之中的。比如中医、国画等，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，既包括遗产，也包括现今人们的创作或新成果。遗产虽有现实意义，但总保有过去时代的局限性；而传统虽然承继遗产，却不必保持原状，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青出于蓝，后来居上。所谓发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就包含这层意思。“反传统”论拒绝这种说法。在他们看来，凡传统，都是“陈旧、滞固的城垒”、“废墟”，都是现代化的对立面，谁要沾上它，就要被“古老的鬼魂”缠身，永远只会向后看了。

其实，遗产也并非就是“历史的沉积物”，辩证法更不会被“古老的幽灵”缠住。因为“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，按其本质，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”^⑤。马克思主义者讲继承遗产，从来都是指批判的继承，反对抱残守缺，食古不化。这几乎可说是一种常识。所以要对遗产一分为二，“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。而所谓“精华”与“糟粕”，既要根据对象自身的性质，又要根据建设新文化的需要，因而“去”与“取”，都不是原封不动的，“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，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，送进唾液胃液肠液，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，然后排泄其糟粕，吸收其精华，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，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。”^⑥如此形成的精华与糟粕，都是按主体的需要经过分解化合后的产物。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“扬弃”说的正确运用和生动表述。只有坚持这一原则，遗产才可能成为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还应该指出，这两句话，不是孤立的，它是“古为今用”、“洋为中用”、“推陈出新”等一系列理论和方针政策的组成部分，相互关联、相互补充、相互生发，其着眼点不是向后看，而是向前看，在今天就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艺术。把它说成是“中庸、保守、墨守成规、固步自封和划地为牢”，这一连串不实之辞，只能表明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。

大家知道，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，关于“传统”问题的论争，并不自今日始。“五四”以来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，有时还付出过沉重的代价。肯定一切者有之，否定一切者有之。历史事实表明，真正能够进行全面科学的总结，找出正确途径的，唯有马克思主义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世界上少有的特殊情况，作出了很特殊的贡献。它不仅对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大国向现代化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，而且也因此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。比较一下前后不同的历史条件，就不难明白，当前这股形而上学的“反传统”思潮，与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否定一切的偏激言论，是有着不同的论争对象的。它主要面对的不是什么封建复古主义，什么封闭保守的城堡，而是对这些东西持革命批判态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、传统观。只不过它是从一个极端的立场出发，把正确的观点和保守落后的东西连在一起，混为一谈，甚至胡说它将“导致现代意识更加腐朽、一败涂地。”这不是

前进，而是倒退，是让错误的东西再否定正确的东西，使其变本加厉地扩展开来。

这一次的“反传统”的理论概念，是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借来的。但那里和我们有着根本不同的社会背景。追根溯源，西方的反传统，有着比现代派更为悠久的“传统”：那就是每当一种新的流派、思潮出现时，往往摆出一副改天换地的架势，向它的前辈发起全面猛烈的冲击，似乎唯独自己才第一次发现了真理。然后，到下一轮，它又被置于同样的地位上。这种方式，也确能引起轰动效应，起到突破旧格局、开辟新思路的作用。但它们的创新，实际上也不能不包含着对某种传统的继承。后一轮的反传统，也没有能够把前一轮的历史地位、现实价值全部“反”掉。西方现代派虽有更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，但一般说来，对传统的文化艺术既有所排斥，也有所继承。有的人还十分明智地指出：“盲目地拒绝过去，势必导致盲目地拒绝未来。”其中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艺术家，往往很自觉地从传统文化艺术中吸收营养^⑦。这就说明，事物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则终究要对人们的实践起制约作用。如果说，在西方社会条件下，极端的反传统的言论有其自然滋生的土壤，有其难以避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，甚至有某些合理的因素，那么，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，这种极端反传统论的泛起，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前提。因此，它比起中国过去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反传统言论来，有着更为直接明确的反辩证法的意识，它要从理论观点、思维方式上挑起新的论争。其兴奋重心，与其说是在对传统进行反思，不如说是借古论今，宣扬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，鼓动一种极端化的否定情绪，其醉翁之意常在于此。

这些年来，极端主义的、形而上学的东西愈演愈烈，“反传统”是它的一个重要口号。其影响所及，远远超过了“传统”问题本身。

(二)

正如历史上许多绝对化的理论观点一样，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往往是极端的自相矛盾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些矛盾的地方，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实质。

中国新起的这种“反传统”思潮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专“反”本民族的传统，只能说坏，不能说好，否则就是“千年帝国之梦”、“中国中心主义”、“文化自大主义”、“阿Q主义”，……事实上，正是在这类帽子横飞的过程中，地地道道的民族虚无主义恶性膨胀起来。与此相联系，这种“反传统”论的另一特点，就是对西方的东西只能说好，不能说坏，否则就是“自我禁锢”，就是“世界弃儿”，……也正是在这类帽子横飞的过程中，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的情绪空前高涨起来。在这里，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弯，从否定一切变成了肯定一切。本来，按“反传统”的逻辑，既是传统，就应在必“反”之列，是不应分中外的。你看：“人类的一切文明不过是一块遮羞布”，“没有对文明的幻灭就没有人的生命的解放。”^⑧这句话的涵盖面之大，可说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，哪里还有半点回旋的余地，算是“反”彻底了。但这同一作者却又大讲什么“接受世界先进文化”，“用世界（西方的）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”，而且公然宣称：“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，中国那样大，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，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”^⑨。唯独这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殖民地文化好得很，不在“传统”之列。真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“遮羞布”去掉之后，就可以使那些误信“反传统的英雄”的人们大开眼界了。

于是，对“人类一切文明”的“幻灭”，就只剩下对中国“传统文化的彻底幻灭和绝望”了。这回可是不必客气，连古代到当代，一古脑儿地囊括进去，说是“传统文化所造成的生命力

阳萎又被中国当代哲学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机械划分所强化”^⑩。在这一套曾经颇为时髦的轻浮言词里，某些人歪曲诋毁的“中国当代哲学”或“思想一元化”，乃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之谓也。“五四”运动以来的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，建国以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切伟大成就，都与这个“中国当代哲学”血肉相连。它是主导，是灵魂。有了这种“思想一元化”，中国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文化艺术才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变革。这是中华民族史上崭新的一页，是民族复兴的伟大长征之起始阶段。尽管我们有过挫折，有过失误，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。新传统既是对旧传统的批判继承，又是在它的基础上的革新创造。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在谈论民族传统时，从来不愿承认传统的新旧之别，不愿承认这不仅没有过时，而且在日新月异的生活中标志着现在、预示着未来的新传统。好像中国仍然停滞在一个世纪以前，或者说，好像一个多世纪前的幽灵仍然统治着现在，“原始循环”，每况愈下。于是写文章，拍电视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荒凉、虚无：“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”，“中国文化……是感性生命与理性生命的双重死亡”，……这民族虚无主义，原本是某些人的消极、阴暗心理的表现，可是到了极端“反传统”论的手中，却被打扮成一副先知先觉的启蒙者、英勇激进的斗士的模样。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、虚无幻灭的情绪和不可一世的派头绝妙地统一在一起了。于是民族虚无主义成了理直气壮的东西。在极端“反传统”论者看来，这彻底幻灭绝望的情绪不仅没有什么不好，而且妙不可言。这叫做：“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正是使国人脱胎换骨的开始。”但是，既然“当代国人”据说连“人格”、“人的生命本体”都有待于“重建”，那么在未建之前，“冲击”的动力在哪里呢？即便有什么外在的神奇力量，如果内里一片枯涸、空虚，甚至还有“古老的鬼魂”占据着，那又能“激发”出什么来呢？这便是极端“反传统”论永远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。如果仅仅是由于健忘或者无知的缘故，对悠久古老文明的评价失之偏颇，倒也罢了。但是对近百年来的巨大变化硬是视而不见，对尽人皆知的建设成就故意充耳不闻，偏要人们相信“衰落”“崩溃”之类的昏话，这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。

不过，这“衰落”“崩溃”之类的昏话，并不是“反传统”大合唱的主题，而是它的前奏曲，重场戏还在后头，这恐怕是许多盲目附合者始料所不及的。你以为极端“反传统”的主旨在论“传统”，那就错了。其真正意图在于“大换血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“全盘西化”。这里，全剧的结构是：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→民族虚无主义→崇洋媚外→全盘西化。没有极端主观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（所谓“逆反心理”的模式化），就不能“造成”从古到今的彻底幻灭心态；没有对“黄种人的文明”和“现有秩序”的怀疑、绝望，就不能“唤醒”对“蔚蓝色文明”（或曰“资本主义”的“工业文明”）的绝对崇拜意识；没有对民族传统、特别是新传统的彻底背弃，那“西化”就很难“全盘”。中国人自尊、自信、自强的精神，实为“全盘西化”之大敌。一旦这幻灭感能像瘟疫一样传播开去，那中国人之“人格”和“本体生命”之“重建”，就会大大加快，无需乎“三百年殖民地”那样劳神费事了。这如意算盘倒也不错，可惜版权却不能尽归当今“反传统的英雄”所有。近百年来，历次“侵入”中国的老手们早就宣传过了，而国内响应者亦不乏其人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近现代的“侵入”者“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”。这些“天生的指导者”，“当然没有被同化的顾虑”；^⑪“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，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”，才引起了中国的“革命”性变化。如此等等，不外是说侵略有理，侵略必胜，中国人文化衰落，理应听人主宰，一切照办。不过，这一套预言并不灵验，中国人民总是奋起反抗，一次又一次地把侵略者赶出去，用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，证明那种灭中国人志气，长侵略者威风“唯心历史观”的破产。这个“黄种人的文明”之所以“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”，

决不是因为它特别落后、衰弱，以致引起那“蔚蓝色文明”的特殊关照，而是由于中华民族“自强不息”、“厚德载物”的创造精神，在现代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善于根据自己的国情，主动向外人学习，发动变革。早在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，毛泽东同志就曾向世界宣告：“近代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、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。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，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。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，就其精神方面来说，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。”^②几十年来，这一复兴大业方兴未艾，新的历史时期，更为之开辟了广阔前景，然而，某些极端的“反传统”论者却不顾历史事实，重弹几十年前就已破产的滥调，甚至胡说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地化是一种进步，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。……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的人权、平等、自由、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。”^③按照这通谬论，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前仆后继，浴血奋战的历史，都不仅无功，而且有过。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还能认为这是什么“创新”之论，是什么“英雄”行为吗？

既然，西方殖民主义传统不仅不能“反”，而且应该继而续之，推而广之。站在这个“角度”看问题，那么，历史悠久，经过近百年火与血的考验，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，当然是一种难以容忍的“例外”。于是《河殇》的作者像算命先生那样断言：“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，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着大炮和铁蹄，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。”大炮和铁蹄早就领教过了；积四十年之经验，“和平演变”的伎俩亦可识破。重要的是华夏后裔自己要有志气。古人云：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逭。自暴自弃，自毁长城，一心想靠别人的恩赐过日子，就是一种最腐败、最危险的思想。任其蔓延开来，难免不攻自破。但这种思想，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背道而驰，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文明，也不能含糊其词地用“古老文明”来概括。至于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，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，我们不仅欢迎，而且要主动地吸收，那是用不着“抵挡”的。我们的改革、开放政策，对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，提供了坚定明确的保证。唯独对那“大炮与铁蹄”的变种不可不防，不会因为有人惊呼一声“挡不住了”，就拱手相迎。《河殇》的作者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变法之艰难，或许就难在我们总在担心‘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？’……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，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、不是德意志人了、不是法兰西人了。唯独在中国，这是最大的忌讳。”这话不对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，短短几十年间，中国发生的社会大变革，为世界历史所罕见。中国人哪一次担心过自己还是不是中国人？恰恰相反，中国人正是为了摆脱被人奴役、宰割的悲惨境地，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，而始终坚持改革的。然而世界上也确实有那么一些人，对这一点看不顺眼，放心不下。他们始终不愿弄明白：中国人还是中国人。他们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，因而始终一贯地反对中国的革命。《河殇》的作者似乎还不知道，“不论是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，还是启蒙运动”，西欧人当时并没有遇到中国人这样的国情。这些作者应该听听阿诺尔·J·汤因比说过的话：“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前，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，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。”^④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人慢慢地觉悟到，世界上确有那么一些人，总想按他们的意志，把中国人“变”得不再是“中国人”。一个多世纪来，这种事情我们还见得少吗？中国人理所当然的不能容忍这种“变”法。如果当年有人要意大利人、德意志人、法兰西人搞这样一种所谓“变法”：彻底背弃民族传统，唯他人之命是从，甘当殖民地或附庸国的臣民，他们就不担心将变成什么人吗？不顾社会历史条件的区别，硬要用这来证明中国人不如西欧人，究竟是谁“浅薄”呢？前事不忘，后事之

师。现在，当有人肆无忌惮地咒诅我们伟大的民族文化，甚至明目张胆地为殖民化唱赞歌时，人们就不能不在“变法”的问题上进一步思考：究竟“变”的什么“法”，朝哪个方向“变”去？不是讲“重建”“人格”吗？作为“中国”人，就不能没有自己的“国格”，不能没有民族之魂。失去了这一切，就没有了“中国”人的“人格”。变到这一步，当然用不着担心还是不是中国人了。这种“变”法，必然要受到广大中国人的唾弃。那中华文化的核心，那民族之魂，将永远巍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，是任何力量无法动摇的。

回顾这些年“反传统”论的发展过程，很有必要。它开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提了出来，本来就是混乱的，最后必然也是行不通的。但它符合一些年轻人的弃旧图新的心理状态。后来愈演愈烈，走向极端，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唯物辩证法。其实际内容，就是彻底鄙弃民族传统（包括旧传统和新传统），绝对地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（包括它们的殖民主义传统），而且曲为之说。本国的传统，好的也说成是坏的；西方的东西，坏的也说成是好的。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，“反传统”被赋予特定的内涵，就是“西化”，就是以“西化”来“反传统”。这是当今中国“反传统”论的实质所在，是它不同于西方“反传统”思潮的基本特点。在这里，否定和肯定都是绝对的，而其最后的“冲击”，便是“全盘西化”论的托出。

必须指出，在同一“反传统”的旗下，真正走到第二步和第三步的人毕竟是少数，但它的影响却不可低估。许多人被这种极端的主观主义、形而上学的观念、思维方式所左右，形成惯性，失去了客观地辨析是非的能力，还自以为大彻大悟，以至在那最后的“冲击”面前，麻木不仁，见怪不怪，这却是我们大家应该深自反思的！

注释：

①⑨ 转引自王昭：《抓住刘晓波的黑手》，《北京日报》1989年6月24日。

②⑩ 刘晓波：《再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》，《百家》1988第1期。

③ 《当代文学文化精神选择的指归》，《文论报》1989年3月5日。

④ 《列宁选集》第二版第二卷857页。

⑤ 马克思：《资本论》，第一卷第二版跋。

⑥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第667页。

⑦ 参阅袁可嘉：《现代与传统——现代派文学历史经验谈》。《文艺研究》1989年第4期。

⑧ 刘晓波：《我看审美》。《文艺争鸣》1988年第5期。

⑪ 周君适：《伪满宫廷杂忆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⑫ 毛泽东：《唯心历史观的破产》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。

⑬ 刘晓波：《启蒙的悲剧——“五四”运动批判》。

⑭ 汤因比·池田大作：《展望二十一世纪》。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焯）